

壹、前言

臺灣教育長期以來因分數導向的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之盛行，將學校課程切割成零碎的考試知識加以填鴨（cramming），傳授可預期的標準化答案，壓縮教師與學生的自主性與人性化空間，周珮儀（2010：4）認為臺灣教育與「麥當勞化」（McDonaldization）性質極為相近。如上述對臺灣教育的填鴨教育或機械式背誦之憂心與指正比比皆是，然而早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界，傳入凱欣斯泰納（G. M. Kerschensteiner, 1854-1932）的工作學校（Arbeitsschule）思想，即明白指出傳統教育偏重主智教育（intellectualistic education），只強調抽象性概念知識之傳達，忽略了情意技能之培養。有鑑於此，本研究將介紹Kerschensteiner的工作學校思想於日治時期在臺灣的發展狀況，希冀能為當今臺灣教育鑒往知來，提出省思，除了反思現今教育的偏差觀念外，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工作教育的正向價值，包括強調實用取向、手工學習，與培養情意精神性的陶冶。

工作教育在現今臺灣教育界是讓人感到較為陌生的，事實上，工作教育的「工作」一詞，原文為德語的“Arbeit”，具有工作、勞動的意思。本來該詞只指身體上的勞動，至十八世紀後更放在精神上的勞動，包括「頭的勞作」（Kopfarbeit）、「書本上的勞作」（Bücherarbeit）、「學者的勞作」（gelehrte Arbeit）及「精神的勞作」（geistige Arbeit）（小林澄兄，1948：1-3）。「工作」在日本被翻譯成「勞作」（漢字）而非「勞動」，是因為「勞動」只有肉體勞動的意義，而「勞作」更包羅了「精神上的行動」之意（土屋忠雄、吉田昇、長尾十三二，1967：164）。因此工作意指「手工」的一種，在日本又被翻譯為「作業教育」、「勤勞教育」與「勞動教育」，強

調手動操作的實用教育。戰後臺灣對於「勞作」的中文意義，較偏向「美勞、勞作」之意，故本研究以「工作」稱之，亦是參考田培林（1976）與林玉体（2008）對於「工作學校活動」之翻法。

Kerschensteiner是二十世紀初倡導工作教育的德國學者，其所主張的「工作學校運動」為富有系統的教育理論，亦在德國的國民學校影響很大。也因其工作學校理論頗受裴斯塔洛齊（J. H. Pestalozzi, 1746-1827）與杜威（J. Dewey, 1859-1952）的影響，當時在國際間也贏得很高的聲望，包括瑞士、瑞典、匈牙利，甚至是英、美國家教育性質的會議，也邀請他發表有關「工作學校」的演講（田培林，1976），因此Kerschensteiner的工作學校理論可說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從德國發跡，影響至英、美，甚至是日本，並傳至臺灣教育界，為當時的臺灣帶來一股工作教育風潮，並延伸至小、公學校內的教育實際作為。

Kerschensteiner生於德國慕尼黑市（München），從小家庭環境非常貧苦，小學畢業後，限於經濟的困難，不能進普通中學念書，因而在主教團體皮亞里斯特（Piaristen）所主辦的師資訓練班中接受師範教育，因此Kerschensteiner 16歲就在一所鄉村小學擔任「助理教師」的工作，接著並升為正式的國民學校教師。後來他又繼續考入高等文科中學（Gymnasium）肄業，對於數學特別感興趣，接著又在維茲堡大學（Universität Würzburg）、慕尼黑大學（Universität München）學習植物、動物、地質等科目。Kerschensteiner在紐倫堡市（Nürnberg）、慕尼黑市等地擔任教師工作，長達12年之久，1895年被任為慕尼黑市的主任督學（Schulrat，相當於市政府的教育科長或教育局長），企圖以「工作學校」為理論基礎進行教育改革，贏得很高的聲望。1918年，辭去慕尼黑市主任督學之職，專心著述，同時任教於慕尼黑大學的「名譽教授」，講授有關教育學的課程。1920年又繼斯普朗格（E. Spranger）為萊比錫大學（Universität Leipzig）教育學教授，不過後來